

回归日常生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再思考

徐业鑫¹ 薛伟芃²

(1.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831;2.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调形成的农业生产生活系统,遗产地居民的意义世界、生存情境以及实践逻辑是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索引。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不仅要关注遗产本身的系统特征,而且要将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纳入视野,在对遗产地居民生活世界的文化阐释路径下,分析其独特的意义网络与表达动力。在此基础上,修复遗产地居民与农业文化遗产互嵌的共生关系,重塑遗产地居民在农业文化遗产中的行动主体地位,进而使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成为遗产地居民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自觉行动。

【关键词】农业文化遗产;遗产地居民;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2-0131-10

Returning to Everyday Life: Rethinking on th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XU Yexin¹ XUE Weipeng²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801;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formed by long-term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nvironment. The significance world, living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heritage site are important indexes for understanding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itage itself, but also bring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heritage site into view, and analyze its unique meaning network and expression power i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fe-world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heritage site. On this basis, we will restore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idents of the heritage site and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reshape the status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heritage site as the main actors in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nd then make the protection of a conscious action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residents in heritage sit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resident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sites; everyday life

一、问题的提出:从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说起

二十世纪下半叶,一场世界范围的遗产保护运动拉开序幕。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

[收稿日期] 2023-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特色农业发展研究”(21&ZD225)

[作者简介] 徐业鑫(1988-),女,博士,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薛伟芃(1999-),女,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人才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旨在发现、保护、传承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让这些遗产能够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公约》确定了自然遗产(Natural)、文化遗产(Cultural)、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Mixed)三种类型,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增设“文化景观遗产”以适应日益丰富的遗产内容。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0余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提出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简称 GIAHS)项目认定与保护工作,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①。

农业是人们根据动植物的生长规律,通过人工培育而获得农产品的生产活动,人类的干预也使得农业与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与共生性,可以说无农业不文化。一方面,正是广义上农业的出现,人们才被组织起来,进而形成社会,并衍生出相应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形成之后又深刻地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演化过程,无论是农业景观还是生产系统,都离不开文化的建构与凝视。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的,“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也是失序的动因;既是一个过时的因素也是一个永恒的因素”^②。文化以其自明性和系统性,完成了自身的连续性,进而形成对不同代际成员的启蒙,使他们用“文化的”眼光认识自然并改造自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文化”并不是抽象的、精英化的知识或概念,而是民俗群体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换言之,文化本身就内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③。农业文化遗产本身便是生态系统与文化图式互相对话、调适达致协同的产物^④,传统的农业生产正是混融于这一日常生活的文化网络之中,因此,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是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历史起源和当代形态的重要索引。

然而,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农业生产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转而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交易产品,农业成为产业的一种,从农民原有的日常生活中被分离并进入专门的经济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也让人们不自觉地将之置于生产和经济领域:或是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对生态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的启示^⑤,或是探讨农业文化遗产通过资源转化进一步变现的路径^⑥,过于强调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及生产功能,忽略了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地居民生活世界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这种思路背后所隐藏的是“现代”对“传统”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审视。

此外,随着遗产名录的扩大、遗产类型的拓展,“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这一基本认定标准,使世界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成为展现国家文化优势的重要符号。与其他世界遗产一样,由于 GIAHS 项目形成了统一的认定体系,不同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存在的个体价值与独特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进入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使特定农业文化升格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似乎正渐渐从保护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的手段变成了目标。对普遍价值的强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文化遗产与居民生活世界的脱节,“文化”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游离出去变为似曾相识却难以言说的抽象概念,进而成为一种超主体、超地域、超历史的资源形式^⑦,这显然背离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

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绝不仅仅是为了保留历史发展的证据或实现经济、生态等价值的转化,其研究旨趣也并非简单地对留存至今的农业生产系统和景观进行被动保护,更重要的是保留与传承人类文明基因的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经过几十年遗产保护的探索,人们已渐渐发现文化伦

① 闵庆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资源科学》2006年第4期。

② [英]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郑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③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恒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7页。

④ 卢成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五个层面及其方法论问题:社会科学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⑤ 许颖、路璐:《稻虾种养系统中生态要素的丢失问题分析——基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视角》,《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年第11期。

⑥ 王方晗:《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生产保护中的遗产运营与遗产增值》,《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⑦ [韩]金光亿:《实践中的文化遗产:看文化不见人》,《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理^①和社区本身对于理解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②。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相互交织的当下社会语境,遗产研究既要对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进行梳理,更要“生产”一种满足人类希冀的“特定未来”。如何选择具有未来意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如何构建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的意义体系?或许如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所说,回到“生活世界”,以文化为索引剖析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特征,以人文为面向深入到遗产地居民自在的、情感的、充满意义的日常生活,应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范式。

二、何为“日常生活”:理论源头及研究范式

“日常生活”是每个个体都身在其中而又浑然不觉的社会存在,它既外化于个体,为其提供可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制度规范,同时通过重复自身而内化成个体的惯习。在前现代社会中,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日常生活”是所有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以及未出生的人所共享的“人类条件”。然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人类社会的时空秩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断裂,日常生活作为各种势力碰撞和融合的场域,开始进入现代性反思的视野,成为一个多学科交汇的学术范畴,并推动了日常生活理论与批判的学术范式转变^③。

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受黑格尔(G.W.F. Hegel)和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的启发,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作为人的自然存在变成转瞬即逝的异己性力量,进而发展成政治经济关系的异化^④。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影响下,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法兰克福学派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学者认为,异化既发生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关系中,也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所谓日常生活是指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的人类条件的集合^⑤,日常生活的异化不仅是物性沉沦,而且用幻觉遮蔽现实和真相,使每一个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自我都生活在虚假的现实表象中^⑥。因此,要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即把“总体人”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之间相分离,推动“日常生活的复兴”^⑦。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被动地站在历史的节点对这些变迁做出科学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变成了有迹可循、符合规律的宏大叙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很多学者发现,这种宏大叙事忽略了在历史中行动的、具体的人,也遮蔽了人类实践的特殊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对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进行反思,他提出人的社会行动才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并将“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韦伯认为只有指向他人、有意义的行为才是社会行动,而行动者对意义的解释会受到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情感等因素的影响,意义贯穿社会行动的始终并影响社会实践的结果。与韦伯几乎同一时期的胡塞尔也指出,科学的实证主义只能说明事实,却无法解释意义,无法解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之谜,近现代以来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科学起源于生活世界,后来却忘却了生活世界^⑧。他认为世界是由人及其实践所构建的,要研究世界的本质,就要朝向

① 胡梦茵:《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元伦理主体与伦理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 石鼎:《从遗产保护的整体框架看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与未来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 张道建:《“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流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④ 张一兵:《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异化——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解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⑤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⑥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5-161页。

⑦ 郑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⑧ 倪梁康:《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基于〈生活世界〉手稿的思考》,《哲学动态》2019年第12期。

其本身,即把握人及其实践的直观表象,而不要被困在结构、概念之中。对胡塞尔来说,生活世界具有原初给予的明见性,也是“存在”的基本场域,因此,具有最高实在性。只有回到生活世界,才能解释观念产生的原初动机和思想方式^①。

受韦伯和胡塞尔的影响,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尝试在社会学内部揭示日常生活的意义^②,与韦伯一样,许茨将“行动者”“意义”“情境”等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但是他认为韦伯对解释“行动者对意义的理解”如何可能并未深入探讨,也未能阐明行动者理解意义的情境关系以及传统文化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构建并影响人对其意义的理解^③。他深刻地指出,日常生活是构成所有社会行动基质、具有主体间际特征的最高存在^④。许茨将日常生活称之为“常识世界”,他认为生活世界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每个个体都只能依据他独特的“生平情境”(包括兴趣、动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使自身处于日常生活之中,借助已经被类型化的常识来认知和行动^⑤。基于共享的、结构化的常识,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并达成合作,因此,我们若要理解人们的行动及其背后的意义,必须植根于日常生活中个体或群体“通过其具体存在所经历的常识经验的丰富整体性”,把握行动者对其所处情境的界定及其对意义的主观解释。

许茨对常识世界的研究拓展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并为“意义理解”提供了解决方案,启发了后来现象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等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作为许茨的学生,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发展了许茨“常识世界”的理论,他们指出源自经验的知识一旦形成并共享,就会具有控制力量,成为这种活动领域制度化的“客观现实”。同时,这些知识储存并整合起来构建日常生活世界,在下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作为真理被学习,进而“制度化为一种主观现实”,这种现实有力地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动,只有当个体是处在“作为整体的知识构建”的社会中才有意义^⑥。他们认为要理解现实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其核心问题是回答知识是如何被构建的。

其实,社会学很早就将研究触角伸向微观的人类日常互动的社会过程中,其最重要的三大研究范式之一——符号互动论,就将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对符号的使用及符号背后的意义作为解释社会的关键问题。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行动者针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基于其对该事物所赋予的意义;二是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的过程当中;三是行动者根据自身的解释来修正这些意义^⑦。也就是说,我们习以为常的“知识”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中生成的,在持续不断的社会过程中沉淀成稳定的符号和意义,成为知识生产的心灵机制并影响后续的知识生成。可见,无论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及其现象世界本质的揭示,还是对“日常生活”形而下的具体实践过程和场景的呈现与分析,最终都在于凸显以往被社会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人类行动,这为我们理解农业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视角。鉴于本文所谓的“日常生活”,属于直接的、可感的经验化范畴,是遗产地居民凭借经验、传统、习惯、情感等因素进行活动的场域,并具有重复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存在主体的、动态的,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的、具有意义的“纯粹经验世界”^⑧。

① 张庆熊:《“朝向事情本身”与现象学运动》,《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② 郑震:《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人文杂志》2016年第5期。

③ 张庆熊:《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以舒茨为中心的探究》,《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④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恒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0页。

⑤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3-4页。

⑥ [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知识社会学论纲》,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57页。

⑦ 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⑧ 户晓辉:《民俗与生活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

三、重回日常: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成与传承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所处环境长期适应所形成的,因此,日常生活对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生成性。首先,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亦是处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行动者。日常生活的特点是在人们满足自身必然性的实践中,通过习焉不察的惯例来完成认知与思维图式的复制和传递,进而形成理所当然的行动结构。行动者在知觉其所面对的客体时,通过统觉转化成其他与之相似的客体,前者作为与后者类型相关的东西而被察觉^①。例如,天山东部南路的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集中了新疆最干旱缺水的地区,在汉代以前这一区域都是以牧业为主,虽“颇知田作”,但农业并不发达。到了唐代,由于大批军士和汉民的迁入以及中原重农文化惯习的影响,以中原汉民日常生活中的水井为基础形成的“井渠法”在新疆地区传播,在不断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特点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新疆坎儿井水利灌溉系统^②。可见,人们并非被动地接受、顺应生态环境,而是会基于在日常生活中所习得的技能与经验对其生存情境加以改造。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成过程中,日常生活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行动出发点”,即使环境发生转变,行动者也可以根据其生平情境的类型化关联,将新事件和新事物转化为“我的”世界。

其次,日常生活形塑了农业文化遗产相对稳定的系统特征。农业生产是人与自然沟通的过程,这种沟通既具有以往农业经验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相互理解性,也包括遗产地居民基于日常生活主体间的行动一致性。在相互理解与行动一致的基础上,只要日常生活情境未发生重大改变,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的各要素也基本保持稳定。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推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的主要力量,在追求典型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日常性。这种日常性不仅表现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也蕴含了遗产地居民的文化逻辑。例如,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种植的水稻品种是长杆稻,这主要由当地农民特殊的收割方式和储存方式所决定。当地人在收割水稻时要唱歌,收割好的水稻也并不立即脱粒,而是整把收起捆成一捆,堆放在储藏房中。当地政府曾大力改良水稻品种,推行短杆稻,以使稻谷在稻穗生长上得到更多的营养,也更容易收割。然而,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收割短杆稻必须弯腰,影响农民在收割时唱歌,而且短稻秆不好成捆,所以新品种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抵制。可见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偏好和习惯,构成了伊富高农民共同的意义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营养”和“方便”只是现代性的修辞,而不能取代“过去的既定性”。

此外,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内群体保证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个体无时无刻不处在日常生活所提供的生平情境之中,这种生平情境同时包含常识思维所具有的自然态度以及共享这一思维的同代人。常识思维克服了作为“此在的我”和“彼在的他”之间的不同视角,达成了对各种关联系统的一致性理解,在面对面相遇的过程中,形成分享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内群体”。在内群体中,成员们会对共同所处的情境达成协议,即对好的、正确的、有效的生活方式的共同认识,并视之为理所当然。因此,一旦某种关联系统被内群体认为正确或有效,这种关联系统就会脱离具体的情境而被认为是客观的和匿名的,成为被“结构性社会化的知识”。这些知识已经经历过“我”的前辈的检验,作为“我”设计行动的基质被再次验证,进而在知识再生产所形成的行动过程类型中成为“我”的后辈的规则和诀窍。

例如,浙江庆元香菇培植的历史悠久,起初山民只是随意在菇木上砍下刀痕生产香菇,直到800多年前,龙岩村农民吴三(后世尊称为吴三公)发现菇木树种的不同,山林坡向以及刀痕方向、深浅不同,都会影响出菇的数量、大小和品质,在此经验基础上发明了剃花法香菇栽培技术。为了避免技术外泄,菇

①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9页。

② 李久昌:《新疆坎儿井的来源与时间考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菇寮白”，这是独属于菇民的菇业行话，行业外的本地人也难以听懂^①。独特的种植技术和保密规范为菇民带来巨大收益，这些内群体知识也成为被“悬置”的传统，在当地菇民的日常生产实践中完成了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代际传承。可见，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与传承，都是在遗产地居民具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完成的。

四、通过遗产：日常生活的情境构成与意义表达

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不同，农业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构成了双向的整体性嵌入关系。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而与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协同演化的产物，它作为一个系统的、未分化的对象化领域全面地嵌入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在连续的、故老相习的民俗群体中形成了稳定的农业生产系统和知识系统；另一方面，稳定的农业生产系统和知识系统一经形成，便被“悬置”为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情境，为行动主体提供原因动机和意义基础。

（一）农业文化遗产构成日常生活情境

农民与工人或其他专业化分工的职业不同，农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是相互混融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产活动在其全部生活的内部^②。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个体或社会群体经验，进而通过结构的社会化再生产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农业生产系统，既包含物质层面的工程、景观、农具、民居等，也包含非物质层面的技艺、知识、记忆、信仰、民俗、仪式。前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物质情境，后者则构成了农民生活的精神文化情境，二者共同作为没有分化的整体性情境被遗产地居民视为既定的东西接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动逻辑。

作为农业生产系统的主体，农民在设计自己的行动时，往往是基于其所处的整体性情境。行动都是由行动者预先设计的，换言之，行动是有动机的行为。许茨将行动的动机区分为目的动机和原因动机，所谓目的动机指的是行动者采取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即预先幻想的指向未来的事态；原因动机则指向过去，是指形成目的动机背后情境性的原因，即积淀在行动者个人生活历史中的经验^③。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往往只用目的动机来解释行动，却忽略了隐藏在设计行动之前深层的原因动机。例如，广西龙胜龙脊梯田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栽种历史，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四位一体”的农业生态系统，自古以来，居住在龙脊地区的壮族和瑶族百姓形成了不许砍树、种树护寨的传统。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维系梯田运转最重要的莫过于位于山顶的水源涵养林，这些森林为梯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活和灌溉用水，因此，不许砍树、种树护寨的传统是为了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然而，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就像我们祖祖辈辈一结婚就要种树，为孙子种树，不种树不能起房子”，种树护树只是重复过去老祖宗做的事，行动的基础在于祖祖辈辈的“一直以来如此”。可见，行动者的逻辑并非是逻辑学家的逻辑，他们的理性是基于农业生产和生活传统框架下的理性，农民的行动以及他的行动倾向都与作为整体的情境和实践有关。正如“托马斯定理”所揭示的，一旦某种情境被定义为真实的，那这种情境就会产生真实的影响，因此，人们更易于采取那些已经被过去证明行之有效的行动类型，并以未来行动的结果再生产出行动惯例的合法性。

由农业文化遗产构成的整体性情境，会对遗产地居民形成一种看不见的规训，进而形成遗产地居民独特的文化习惯，涉及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例如，陕西佳县古枣园和山西稷山板枣生产系统，都是以枣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系统，对于两地百姓来说，枣是“铁杆庄稼”，最好吃的莫过于枣糕、蒸枣，

① 王斌、闵庆文、柳林飞主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列读本——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第73-83页。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第297页。

③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69-74页。

家有喜事宴请亲人邻里,餐桌上也离不开枣。每逢年节,佳县泥河沟的百姓也会用枣做的面塑给孩子佩戴以求吉祥,可见,枣已渗透进他们的饮食习惯、民俗仪式等方方面面。食物在社群内部仪式场景中的使用,体现了成员对于社群本身及其内在意义的期待^①。枣农们对枣的喜爱,不仅是由于枣本身香甜味美、营养丰富,更重要的是,枣农在世代种枣育枣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枣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文化偏好。对于身处情境之中的百姓来说,这种文化偏好虽习焉不察,但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感受和选择,进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表达。

(二)农业文化遗产承载日常生活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互动的产物,自然领域是给定的、自在的系统,当人类在其中活动并完成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时,它就已经成为人类获得生存手段、构建意义规则、实现自身再生产的“人类条件”。人们所经验的不止是一个自然世界,也是一个文化世界。正如前文所说,农业文化遗产构成了遗产地居民得以在其中活动的整体性情境,同时也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其所处情境构建了一套固定的符号,人们在与自然和其他社区成员的互动实践中赋予这些符号以内容和意义^②。一方面,耕地、牧场、农具、农产品、牲畜等农业生产系统的物质层面,为人们选择、构建符号及其意义系统提供了原始素材,这些具有意义的符号进入人们知识生产的一般图式,在情境参与者的重复性实践中获得再生产,进而形成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符号意义体系;另一方面,稳定的符号意义系统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奠定基础,形成解释或挑战现存秩序的规则与规范,为日常生活提供意义^③。

行动者基于对符号及其意义的理解而采取行动,人们在赋予符号意义的同时,构建了自我、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鱼是我国传统的吉祥物,一是鱼腹多子,符合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朴素理想,二是“鱼”与“余”同音,表达了人们企盼丰收富裕的美好愿望。在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的形象更是无所不在,对于百姓来说,田鱼不仅满足了食物需求和生计安全,而且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在青田,不仅流传着众多关于田鱼的动人传说,“青田鱼灯舞”更是享誉世界。“青田鱼灯舞”由“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泛白”“鲤鱼跳龙门”“冬鱼结龙”五个基本阵图构成,在人与鱼的复调叙事中,既表现了青田百姓对于四季中田鱼生活习性的熟稔,也寄托了百姓们鱼跃龙门、飞黄腾达的人生愿望。当一系列符号在群体互动中完成编码并被反复展演,便会生成普遍性的意义,进入人们的心灵机制、影响行动并成为行动的一部分,借由这一社会过程,属于地方的集体意志和道德情感也得以塑造。

五、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

正如前文所述,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农业生产系统与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互相嵌入,混融于未分化的生活世界中,这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之活态性特征的根本所在。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不仅要关注遗产本身的系统特征,而且要将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纳入视野,这也意味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对日常生活的转向,在对遗产地居民生活世界的文化阐释中,分析其独特的意义网络与表达动力。

(一)从价值到意义: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目的性转向

作为表达主客体关系的关键概念,价值和意义的内涵相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用,二者都可以表达客体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也可以指代主观的精神或心理现象。但二者又有所区别:价值研究起源于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描述,进入哲学领域的价值虽然被发现其所具有的情感性、非理性等维度,但都是以特定世界观或人生观为参照的反思对象,其载体主要是抽象的观点或观念,因此,常被作为评判

① 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② 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③ 衣俊卿:《论日常世界与非日常世界——透视人类社会结构的新视角》,《学术交流》1992年第3期。

的依据和标准。相较而言,意义可以作为前反思的内容或原型进入文化编码,赋予自然或社会事物以内容和含义,并以符号为载体,人们借此构建并解释自己的生存情境。

一直以来,价值都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问题,这既是源于对新遗产类型进行本体论解释的惯例,也是构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学理性及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践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农业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生态、历史、社会、经济、伦理等多元价值并取得广泛认同^①。已有研究既呈现了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整体性、多维度的特点,同时也将其成功地从“传统的”框架中转换到“现代的”话语体系中,为人们重新认识这些农业生产系统及农业景观奠定了基础。不难发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现代农业发展遭遇瓶颈亟需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上,也就是说,农业文化遗产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对于破解“石油农业”所带来的生态以及社会问题具有正向的功能。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本质上是基于所谓“满足需求论”的价值推演,在“精英—草根”的表达语法中,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解释权不再属于遗产地居民,遗产地居民只能被动接受对于他们来说或暧昧或晦涩的专业术语。

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这种意义在进入人们认知领域之前就已经被符号化了。所谓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目的从价值到意义的转向,指的是挖掘和整理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典型符号,并以当地人的视角阐释这些符号所承载的内涵意义及其编码机制,进而理解遗产系统中由语言、文字、图像、造型、动作、声响等符号系统所联结而成的意义之网^②。这一“编织”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之网,蕴含了遗产地居民所有行动的前提和动机。然而,在土地利用系统与农业生产景观经过官方评定成为“遗产”的过程中,地方性的文化符号被选择、抽取并加以阐释,构建符合“正确”标准的话语方式。这种符号与意义的重新编排,形成了“借助于过去的文化生产的新方式”,在实现传统元素“遗产化”的同时重构了遗产主体的表达动力。

所以,这一转向至少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用文化主体的意义解释来替代文化他者的价值构建,借助意义本身所具有的情感性和规则性特征^③,解码人们日常生活与生产的生命体验与心灵结构。二是追问在后遗产时代文化符号及其意义网络所发生的改变,以及遗产地居民如何在旧符号与新意义之间建立阐释框架,进而重塑自我与群体的认同。解释意义并在意义结构中找到我们的方位,就必须回到人类主体的各种行动,主体的一致性越多,行动的模式化和标准化程度就会越高,其中所潜在的就是“我们必须进行解释的意义框架”^④。只有找到文化符号及其意义的主体性解释,呈现遗产地自身的文化逻辑,才能在遗产化运动的实践中找到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平衡点^⑤。

(二)从景观到情境: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实践性解释

景观,作为地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指一种客观存在的地表形态或土地利用方式。“农业景观”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学者们对于农业景观的探讨主要是以农业景观本身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生态价值^⑥、美学价值^⑦、经济价值^⑧等,即把农业景观视为外在于遗产地居民的客观实体加以观照^⑨。

① 闵庆文、何露、孙业红等:《中国 GIAHS 保护试点:价值、问题与对策》,《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 年第 6 期。

② 聂楠:《论民俗艺术的认知取向与符号系统》,《民俗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③ [英]维克多·特纳著:《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9-30 页。

④ [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第 11-20 页。

⑤ 张多:《遗产化与神话主义: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神话重述》,《民俗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⑥ 苏伯儒、刘某承、李志东:《农业文化遗产生态系统服务的复合增益——以浙江瑞安滨海塘河台田系统为例》,《生态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

⑦ 吴灿、王梦琪:《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美学的构成与自洽——以紫鹊界梯田为例》,《文艺论坛》2022 年第 4 期。

⑧ 孙业红、闵庆文、刘某承:《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多类型比较——以技术型、景观型和遗址型遗产为例》,《资源科学》2013 年第 7 期。

⑨ 李正元:《栖居与消费的联结: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营造逻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然而,农业文化遗产不是静态的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的堆积,而是一个以农为生的民俗群体动态的农业活动场域。这种实践性内涵了“在情境中”的不可化约性,换言之,“景观”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是将“现实的方式”与“可能的方式”关联起来的过程^①。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既要农业景观和生产系统进行一般性描述,也要在客观化的技术程序之外面向日常生活本身,把目光投向意义得以发生的普遍情境,这也是社会科学解释社会实在的必然要求^②。某种程度上,这种普遍情境与由习俗和惯例构成的常识世界拥有共同的边界,这也是观察遗产地居民行动时必然会遭遇历史问题的原因。也就是说,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地居民的意识经验中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农业景观和生产系统,而是在习俗提供的一系列相互联结的特定意象所组成的统一体中呈现的。

习俗和惯例帮助内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以类型化的方式界定其情境,并通过实践感派生出一套由非命题性知识构成的实际的经验范畴和关联系统。习俗使内群体成员获得看待世界的统一方式,并使所经验的一切客体有序地纳入到前反思的意义之网中。为此,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形态特征和系统结构,不得不进入遗产地居民生活世界中由习俗所关联的类型化视域。诚然,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还包括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构成,然而,这些自然构成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客体,它们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通过主体间性持久而具体的构造所共同经验和解释的东西。因此,自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人的意义,并作为人的实践领域而成为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

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技术、新文化、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由习俗的关联系统所形成的稳定秩序被打破,“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也被怀疑甚至抛弃。一方面,农业生产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实践领域,年轻人迫不及待地逃离土地,传统的农业生产系统难以为继走向衰亡;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些濒危的农业生产系统而开始的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工作,使原属于内群体的生活情境,一夜之间变成政府、企业、游客、学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场域。由外因导致的乡村社会历时性的变迁,震荡了包括农业生产系统在内的人们原有的日常生活情境,重构了其内在的意义结构。要理解这种变化,不能用简单的实用主义的模型或概念进行概括或判断,而必须结合其所生成的情境解释行动者们的实践过程。在这一层面上,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意味着一种研究视角的变更,即对遗产地居民主体性的回归。

(三)从遗产到人群: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伦理性重构

所谓“遗产”,最初是指死者留下的财产,我们现在所说的“遗产”除了其在法律和经济上的含义,更多是指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对于文化遗物和存留进行搜集和保存的习惯,但只局限在个人或某个小众集团内部,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尤其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遗产”的概念获得了空前的扩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延续至今的“遗产热”。从食物到建筑、从文化到自然、从物质到非物质,都可以成为“遗产”,可以说遗产无处不在。随着全球性的遗产挖掘与认定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入保护名录,遗产排序和清单化管理使遗产的意义仅仅体现在是否符合认定机构的标准。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所依靠的是“专家系统”,而非地方性知识^③。为了更好地实现遗产认定的可操作性,一套固定的标准把技艺、食物、仪式、景观、建筑从遗产地的日常生活中“剥离”以进行保护,遗产本身的独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情感性湮没在模式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话语体系中^④。

① 舒瑜:《英戈尔德“新生态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② 周福岩:《民俗与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论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向度》,《民俗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18页。

④ [澳]罗德里·哈里森:《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范佳翎、王思渝、沈山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7-21页。

文化遗产尤其是农业文化遗产不只是被凝视的“他者”,而且是不同时段各类行动者活动其间的连续体,必然受到个人或群体能动性的影响继而反作用于个人或群体。在“适应性再利用”的理念下,遗产和遗产地经过“传统的发明”转而成为异乡人所追寻的“故乡”,对当地人却是故乡变“他乡”,导致遗产只能被“消费”,而很难被“传承”。由于各种原因所带来的遗产地居民“离场”已经成为遗产保护的瓶颈^①,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要回答的不仅仅是遗产本身的特点、类型、排序、价值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透过遗产理解人类活动的轨迹和逻辑,包括人们是如何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互动中构建其活动场域并在其中行动,以及新条件出现后,行动者价值观念和群体情感的变化所带来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之间的张力。

综上,转向日常生活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是超越表象与构造,换一种视角重新“看”农业文化遗产。首先,研究目的不再仅仅是“资源论”影响下的价值挖掘,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文化世界中,理解其文化网络的意义体系;其次,研究方式不再是保持距离的审视,而是参与其中,在具体的情境中解释遗产地居民达成一致的实践感;最后,研究伦理基础不再是遗产及其认定标准,而是遗产与人群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这三个层面所组成的“解释的闭环”,有可能弥补“遗产失真”的遗憾,因为“最大的真实”就在于日常生活本身。

余 论

遗产处理的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更是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其本质在于探讨人类应该以及将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日常生活的转向和回归,意味着以对行动主体、意义网络与行动情境的强调为核心,问题意识由“遗产是什么”变更为“通过遗产”,从作为“实体的遗产”变更为作为“实践的遗产”,从作为“看的对象”变更为作为“看的视角”,从关注遗产“有用性”的知识论、认识论等本质主义立场变更为关注遗产主体日常性、习惯性、持续性的生存主义立场^②。

农业生产系统是人们为了生存、实现个体和社会再生产而进行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产物,这些系统内嵌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与人群、自然、社会处在主体际的混融世界。随着现代世界的“工具理性”侵入传统的农业社区,自然变成了与人类社会截然区分的“他者”,农业景观与农业生产系统也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是以,要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必须将遗产地居民及其日常生活重新纳入研究视野,在主体性、地方性和过程性的框架中分析农业生产系统的生成情境和存在意义。在此基础上,理解遗产地居民的心灵图式和行动逻辑,重构遗产地居民与农业文化遗产之间共生、共在的认知关系,或许可以将农业文化遗产重新嵌入遗产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使保护遗产成为内群体成员“理所当然”的自觉行动。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徐业鑫:《文化失忆与重建:基于社会记忆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传承》,《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

② 周福岩:《民俗与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论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向度》,《民俗研究》2020年第4期。